

[Studies in Literature]

City and City Affairs: The American Cities in Saul Bellow's Works

ZHANG Xianjun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City, China

Received: July 21, 2021

Accepted: August 26, 2021

Published: November 30, 2021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Xianjun. (2021). City and City Affairs: The American Cities in Saul Bellow's Work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01;3, 139-148, DOI:[10.53789/j.1653-0465.2021.0103.015](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1.0103.01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1.0103.015>

Abstract: A city is a collection of buildings and a multiple complex of geographical spac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pace, and the people's daily living space. As a scholarly writer, Saul Bellow has a clear mind. Instead of regarding the city as a dangerous place like 19th-century writers, he integrates the real city with the literary one. He not only describes the cities with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structure, the cities with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ymbols, as well as the life scenes of American cities — Chicago and New York. It is through people's activities and events in the city to trigger people's in-depth thinking modern urban problems caused by activities and events of people in the cities, guiding them to take steps to solve the ailments of the cities that cause "urban sorrow".

Keywords: American literature; Saul Bellow; city of literatur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ANG Xianjun holds a doctoral degree in literature. He works in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is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literary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城市與城事

——索爾·貝婁作品中的美國城市

張憲軍

內江師範學院文學院

摘要:城市不僅僅是其中所有建築的集合,而且是某一地理空間、政治與文化空間和市民日常生活空間的多重複合體。作為學者型作家,索爾·貝婁有著清醒的頭腦,他不會像十九世紀作家那樣簡單地視城市為畏途,而是將現實的城市與文學城市相融合,不僅僅為讀者描繪了地理空間結構的城市、政治和文化表徵的城市,以及美國都市芝加哥與紐約的生活場景,更是通過城市中人們的活動和發生的事件去引發人們對現代都市存在問題的深入思考,



引導人們採取措施來解決引發“城愁”的諸多“城痛”。

關鍵字:美國文學;索爾·貝婁;文學城市

引言

城市空間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和地理方位,擁有街道、園林、自然景觀和地標性建築物等,而作為文化的存在,則是一種拋棄了傳統的地緣、血緣紐帶而形成的不同於鄉村生活的獨特的生活方式。它既呈現出客觀的空間地理位置,各具特色的文化場域,又揭示了主觀的生存氛圍。索爾·貝婁貝婁在深重的城市苦惱中長大,善於觀察都市生活的結構和習俗,對城市每個角落進行細緻入微的觀察,並且對城市意象精雕細鏤。所以,約翰·雅各·克萊頓曾說:“又有誰能比貝婁更瞭解這個城市的分崩離析、荒唐和物化呢?”敘述中的空間形式無須在一個完成了的或完全的系統意義上單獨建立一個封閉系統,它可以包括無限制的、甚至是無窮的關係系統。所以,貝婁在其眾多文學作品中都展現出他熟識的城市文化符號,將城市生活和城市體驗真實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描繪了一幅幅美國城市生活的浮世繪。

一、地理空間結構的展現

作家在作品中再現城市空間以獲得真實感和現場感時,其城市書寫必然受制於具體的城市地理空間,從而使其作品具有特定歷史時期城市空間的特性。索爾·貝婁主要運用在空間中展開時間的方法,又讓過去、現在能夠以某種方式在空間上同時展開,從開始文學創作到最後的作品,芝加哥與紐約這兩個城市的歷史空間與現實空間使索爾·貝婁的作品具有一種“如在”的感覺,讓其作品人物活動在其間,演繹著自己的悲歡離合、生老病死。

在《芝加哥城的今昔》中,索爾·貝婁寫道:“芝加哥,建造了自己,又毀壞了自己,然後把瓦礫運走,再從頭開始。毀滅於戰火中的歐洲城市,慘澹經營,又恢復了原來面貌。芝加哥卻不謀求恢復,而是營造出具有天壤之別的東西。在這裡,指望穩定,那簡直就是發瘋。”^①在這個城市中,哈波大街上留存的表徵著生活連續性的醜陋透頂的建築與西部的新摩天大樓並峙,新建的公寓和商城區與已陷於停頓的古老工業區共存。

在過去的半年內,更多的街道被拆掉了……整整一條街被拆掉了。羅維的匈牙利餐廳被清除了,還有本的檯球房和磚砌的古老車庫,還有格拉奇的殯儀館……時間的廢墟被推倒了,而且被堆積起來,裝上卡車,然後當垃圾倒掉了。新的鋼樑正在豎起來。肉鋪的櫥窗裡不再懸掛波蘭式香腸……舊的商店招牌也不見了。^②

所以,雖然芝加哥的歷史並不很長,但對居住在這裡地的居民來說,他們也擁有自己的紀念碑和廢墟,而芝加哥的加速發展,把幾十年的時光密集地濃縮在了一起,使城市居民親眼見證了它的歷史變遷。

在芝加哥,索爾·貝婁度過了他街頭巷陌摸爬滾打的童年生活,對於這個城市可以說是瞭若指掌,索爾·貝婁在作品中基本上是歷時描繪了他生活過或者熟悉的區域,見證了美國城市裡溫暖的街道生活的消失。在其筆下,奧吉·馬奇和澤特蘭生長在狄維仁街以波蘭移民為主的聚居區,猶太人很少,街道破敗不堪,建築都是平房和三層樓房。波蘭移民小小的“磚房都漆成了鮮紅色、栗色和糖果綠。草坪都用鐵管圍起來”^③，“他們每家的廚房牆上都貼滿鼓鼓囊囊、油膩褪色的心形象,在聖餐會、復活節和耶誕節時,門口掛著

聖像和花兒乾枯的花籃。”^④住戶常常將作廢的燒水罐截成兩半，擱在草地上養花，在鮮紅磚牆映襯下花盆顯得銀光閃閃。幾十年後，這裡變成波多黎各人的天下，但燒水罐做成的花盆仍是這一街區的風景，天竺葵花開如舊。大蕭條時期芝加哥黑人區，“天很冷，寒風吹著，黑人居住區到處一片破敗、醜陋的景象……。”^⑤在這裡讀者看到，寒風吹著垃圾與廢紙貼地漫舞，開關門時冷熱氣體交錯形成了白霧，一家人在黑暗中眼睛一齊向來訪者注目，以及喝醉後赤裸女子的瘋言瘋語。經過了經濟復蘇和科技發展，50年代以後芝加哥貧民區的狀況是否有所改觀呢，情況顯然不令人滿意，在南芝加哥，

“我們仍然坐著，繼續喝威士卡，打牌賭錢，抽雪茄。這間坐落在南芝加哥的廚房，不時透進來銅廠和煉油廠難聞的氣味，房頂上電線密如蛛網。我時時注視著那些在這重工業區殘存的奇特生物。在那充滿油味的池塘裡，鯉魚和泥鰍仍然生活著。黑人婦女用麵團做魚餌，在那裡釣魚。在垃圾堆不遠的地方，還能看到土撥鼠和兔子；紅翅膀的烏鴉帶著肩章，就像穿制服的招待員一樣，從香蒲樹上空飛過。某些花兒仍然頑強地開著。”^⑥

黑人貧民區如此，西印度貧民區又如何呢，“這裡就像環礁湖畔波多黎各首府聖胡安的某些地帶的景象。湖水泛著泡沫，散發出爛牛肚的氣味。街上同樣是破牆皮、碎玻璃和垃圾。商店門口同樣是外行用藍粉筆寫的歪七斜八的字。”^⑦貧民區的這種狀況到了二十世紀60年代一如既往：

“黑人住的貧民窟裡散發著臭氣……較遠的西部都是工業區。在蕭條的南區，到處是污水，垃圾，一層金礦的廢礦泥發著閃光。原來的牲口圍場已經廢棄，一座座紅色的高大的屠宰場，在孤獨之中破敗腐爛。然後是呆板單調、有點嘈雜的平房住宅區和貧瘠荒涼的公園。”^⑧

在貧民聚居區的小房子裡，歐洲移民和從農村遷居城市的黑人們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充盈著賭博、強姦、野種、梅毒和喧囂的死亡。

與貧民區髒亂差的生活環境截然不同的是芝加哥鬧市區的繁華。當西特林到訪花花公子俱樂部，站在摩天大樓上四外瞭望時，他看到：

“現在我們處於芝加哥最迷人的一角，我得描述一下周圍的環境。湖岸的景色十分壯觀。我雖然沒有看到一切，但對這裡的一切我非常熟悉，而且對它們有著深切的感受——密執安湖金波激盪，浩淼的湖水岸旁是閃閃發光的馬路。人們驅走了這片土地的空曠，而空曠的土地對人的回報只是微乎其微的善意。我們坐在這裡，周圍充斥著美女、醇酒、時裝，以及戴著珠寶、灑著香水的男子，一片財富與權勢的阿諛奉承。”^⑨

貧民區的存在使得城市平民得以在城市生活下去，而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說，“城市中的貧民區，本身就是一項對比設施，因此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使他們想起既有富人也有窮人。由於有了窮人，富人才得以從驕奢淫逸的生活中得到無窮的樂趣，得到額外的收益。”^⑩

對於芝加哥來說，無論是奧吉和路易大蕭條中苦難的經歷，澤特蘭平淡的成長過程，還是40年代以後洪堡、西特林、赫索格、科爾德諸人的城市生活，故事的場景都是該城的真實地點，在城市歷史中是有據可查的。“我在描寫芝加哥的環境時其實是看得見它們的。環境自己在表現著自己的存在風格，我不過是把這種風格精緻化了。”^⑪這就使人們覺得，作家在文學創作時突出並強化了故事時空的時代性和真實感，使人們



閱讀時不自覺地感同身受，與作品人物同悲喜共命運。當然，他對紐約的描寫也不例外。

但如果說在貝婁的作品中，芝加哥是以居民區的地理空間結構形式以及它的發展變化呈現在讀者面前的話，其紐約真實地理空間描寫對讀者吸引力最大的則是城市地標，圍繞著能夠代表紐約特徵的地標性街區展開敘述。因為街道“既表達它清晰的世俗生活，也表達它曖昧的時尚生活。街道還承受了城市的噪音和形象，承受了商品和消費，承受了歷史和未來，承受了匆忙的商人、漫步的詩人、無聊的閒逛者以及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最後，它承受的是時代的氣質和生活的風格。”¹²而這些地標性街區作為故事背景出現，往往會積澱成為一種城市意象。

貝婁作品中首先寫到是華爾街。華爾街位於曼哈頓島南部，這裡的聯邦廳曾是獨立後美國第一屆國會所在地，喬治·華盛頓在此就職總統，不過它作為美國政治中心隨著遷都華盛頓而時過境遷，但它作為美國金融中心卻持久輝煌。作為美國和世界金融和投資中心的象徵，華爾街比其他任何地方更能代表金融和經濟的力量，在這條街道上的各個辦公樓中，富有才華的人們經營著巨大的財富，在創造效率的同時也賺取了金錢。對於全世界的金融從業者與投資人來說，華爾街就是眾望所歸的資本市場的聖殿，不過，它既能使人一夜暴富，也能使人頃刻破產。1929年股市大崩潰就使美國和歐洲數百萬人陷入破產境地，引發了震撼全球的經濟危機，進入大蕭條時期，這場大蕭條在貝婁的小說和散文作品中每每被提及。然而大蕭條過後，經過恢復後的華爾街繁忙依舊，《只爭朝夕》中，特莫金把威爾赫姆帶到人聲喧嚷的交易所中，讓他見識到了這裡投機與牟利的狂熱，也從他手中騙走了最後的存款。

貝婁作品中紐約的第二個地標是格林威(尼)治村，這裡是紐約浪漫主義和實驗藝術的發源地，是紐約最具有文化色彩的社區。不同於華爾街的高樓大廈，這裡有迷人的街屋、隱蔽的陋巷以及翠綠的庭院。1910年，一些尋求藝術創新和個人自由的作家、藝術家被這裡低廉的房租所吸引來此居住，發現這裡宜人的城市景致和人文氣氛與巴黎塞納河畔的左岸十分相似，因此這裡聚居了大批尋求成功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們在地下室的俱樂部中，在搖曳的燭光裡朗讀詩作，交流思想。這些人古怪的行為做派和不同尋常的穿著打扮，形成了這裡的波西米亞風格。詩人洪堡早年就是在此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的，此時的“美國處於一種極度的狂亂之中，它期待著從貧民窟裡迸出‘反基督’來。可以與此相反，這位洪堡·弗萊謝爾卻捧著可愛的禮物出現了。他的所作所為有紳士風度，顯示出迷人的魅力，因此受到熱烈的歡迎。”¹³但曾經吟誦出快樂詩句的他也隨著格林威治村波西米亞風格的衰落而走下坡路，被主流社會所排擠，直至死亡。而認為“沒有詩歌確實也就沒有人類生活”的澤特蘭與妻子在一九四零年搬到了城裡，在貝利克街住了十多年，他們立即成了格林尼治村裡著名的一對。在芝加哥，他們不知不覺地就成了放縱不羈的波希米亞人，而在格林尼治，澤特蘭被認同於文學先鋒派和政治激進派。¹⁴

百老匯大街是貝婁作品中另一個標誌性街區，這裡是紐約演藝文化的中心。百老匯戲劇藝術在上世紀20年代達到鼎盛時期，但這種繁盛卻因20年代末爆發的經濟危機而趨於蕭索乃至停止，經濟危機過去後，百老匯的戲劇演出逐步恢復並超越以前，不斷締造新的輝煌，多彩的舞臺劇演出成為紐約這個世界大都會的亮點。貝婁作品中許多主人公在此經歷了自己的成功與失敗：西特林的第一個劇本《馮·特倫克》在貝拉斯科劇院連演八個月，使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威爾赫姆則在這條街道的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尋找著騙走他存款的特莫金。

二、政治與文化的表徵

城市記憶不僅僅是一種集體記憶、歷史記憶和社會記憶，還是一種文化記憶，所以“城市不只是建築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種密切相關並經常相互影響的各種功能的複合體——它不單是權利的集中，更是文化的

歸極。”^⑤密集的人口和發達的經濟文化,吸引著大批民眾聚居城市,特別是在二十世紀 20 年代就已實現城市化的美國。在《文化地理學》中,邁克·克朗認為地理景觀和社會意識形態互為共存並相互制約,地理空間研究具有深厚的文化價值。同樣,地理空間對文學含義的構建也有著積極作用,現代文學作品中的環境與地理景觀脫離了傳統的含義,作為一種象徵系統和指涉系統,和其他文學元素配合參與了文本的敘事以及作品主題意蘊的生成。貝婁作品中的城市表徵著美國政治與文化,它在現在和過去被同時感知到,當然這種表徵往往不是在作品中正面展開的,而是隱入小說的背景中,在背景中凸現出來。因為純粹的空間性是一種為文學所渴望的、但永遠實現不了的狀態。

除了在一些文章和演講稿中談到政治外,貝婁的小說沒有一本(篇)是政治性作品,然而首部長篇小說就涉及到了政治。作品中的約瑟夫在加拿大出生,從小移居美國,在芝加哥上學、工作、結婚成家,他全身心地融入到美國,將美國視為自己的家,卻仍是沒有美國國籍的外國僑民。人文地理學注重地與地協調、人與地協調以及人與人協調,但這種協調在美國寬容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現實生活中卻很難達成。出於對美國的熱愛,戰時約瑟夫報名參軍,然而他的身份需要經受長時間的審查,在此期間他不得不辭去原來在旅遊局的工作,而失去工作的他在生活上又處處碰壁,只好待在房間裡,與世隔絕。這裡就涉及到了美國的移民政策,當時的美國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們,作為鄰國的加拿大也成為美國移民的來源國之一,雖然這些移民從小就生活在美國,但他們仍然得不到充分的信任,與美國公民是有區別的,“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我還是依然故我。但是,關於我目前的身份問題,我卻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我只能說明我過去是怎樣一個人。”^⑥而城市的真實權力被貪污腐化的政客所掌控,他們不會為真正有意義的事情盡心盡力,工作效率低下,又對移民持懷疑態度,所以審查一拖再拖,而約瑟夫的一腔熱情就在這個過程中消磨殆盡。

知識份子在美國的發展中曾起到巨大作用,獨立戰爭時的主要領導人佛蘭克林、傑弗遜等都是著名的知識份子,他們代表著民意,然而進入現代後美國的統治者將知識份子分裂開來,當權者追求的是經濟穩定和繁榮,科技型專家倍受重視,因為他們能推動生產力發展,而人文知識份子卻受到排擠,因為他們的存在會給政權帶來麻煩。“華爾街是權力的代表……詩人就像醉漢和不合時宜的人,或者精神變態者,可憐蟲;不論窮富,他們毫無例外地都處於軟弱無力的地位。”^⑦對於知識份子來說,不管你情願與否,往往在不知不覺間被拖進權力鬥爭的旋渦,在捍衛浪漫主義的鬥爭中,詩人洪堡失敗了,他想組建“文藝內閣”,而當權者和民眾卻認為美國真正意義上的偉大是物質上的成功,持相反立場的洪堡自然不受歡迎,只能成為邊緣人。西特林為防止邊緣化,奴性地將自己綁在中產階級的戰車上,昧著良心地為那些大人物寫所謂“真實”的傳記,歌功頌德,所以他能夠作為貴賓,由顯赫的官員和一流的新聞記者陪同,出席在紐約舉辦的文化活動,而洪堡卻只能躲在路邊啃硬椒鹽餅,在小旅館裡默默病逝。

美國內戰後黑人獲得人身自由,大部分離開南方種植園進入北部或中西部城市,但名義上的解放並不能消滅種族歧視,黑人在升學、就業等方面實際上存在極大的不平等,為了安撫黑人在就業上的不平等,美國政府在失業救濟方面對黑人有所照顧,而這種不平等的照顧對於那些失業的白人來說則更能激起他們的憤怒,所以,生活艱難的斯泰卡很是不滿:“可是領救濟金的人可不少——都是假的!他們沒有弄不到手的東西,他們隨時都可以到綏夫特阿莫公司當工人包火腿。他們通過屠宰場找他們去幹活。他們從來不少失業。只是他們寧可躺在懶床上,吃公家的。”^⑧然而,黑人和白人之間的不信任和敵視並不能靠政府某些小的政策傾斜而有所緩和。特別是在黑人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下,黑人暴力行為在美國的大城市裡屢見不鮮。為了避免種族歧視的嫌疑,有關部門對黑人的一些犯罪行為,只要不造成巨大影響,盡可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並且政府的這一做法也影響到了普通民眾,

“我(指西特林)離開芝加哥的那個週末,就報導了二十五起兇殺案。我真不願意去想真正的數字



究竟是多少。上一次我乘傑克遜公園的高架鐵，有兩個黑人流氓在那裡用刮臉刀割一個傢伙的褲兜，而他卻裝作睡著了。二十個人都眼睜睜地瞅著，我也是其中之一，卻奈何不得。”¹⁹

一院之長科爾德懸賞尋找黑人合謀殺害白人研究生的證人，反被誣為“種族主義者”。事實上，美國的種族問題特別是黑人問題一直未能很好地得到解決，一方面是由於白人從心理上瞧不起黑人，認為他們粗魯愚昧，在就業等問題上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態度，而美國政府為了既不得罪白人又要安撫黑人，就在失業救濟金上對黑人多一些照顧，在黑人犯罪方面多一些原諒，而綏靖的後果則是白人和黑人都不滿意，他們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黑人不願意工作而依靠領救濟金生活的人數越來越多，黑人犯罪現象愈加嚴重，所謂“種族平等”造成了實際上的不平等，並且這種不平等引發的社會問題一直嚴重威脅著美國社會。貝婁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提出了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應該關注的問題，希望引起重視，但他左右不了美國的政治，所以幾十年過後情況依舊。

在貝婁看來，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沒有文化的城市就像一個空殼，紐約和芝加哥在文化上具有重大差異。相對於紐約來說，芝加哥是粗暴的，“在屠宰技術方面芝加哥一度領先世界，千千萬萬的牲口在這裡死掉了。”²⁰但即使在以殺戮著稱的年代裡，也有許多學者、建築師、詩人、音樂家從別處聚集到芝加哥，“初看起來，你可能會說這對詩人來講是個糟透的地方，但事實上，當詩人需要清醒的頭腦時，它卻是個好地方。”²¹在芝加哥南區，1912年前後聚集了德萊塞、桑德堡和舍伍德·安德森等大批的小說家和詩人，他們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風俗和道德上大膽解放，形成了芝加哥的“文藝復興”，但時光推進到20年代末，這裡的文化生活就日薄西山了。“駛離芝加哥的火車裝載著豬肉，也裝載著詩人，而城市也迅即淪為了地方的時尚。”²²“芝加哥有的是美妙動人的事情，可是文化卻不包括在內。我們這個地方是一個沒有文化然而又滲透著思想的城市。沒有文化的思想只不過是滑稽的代名詞而已。”²³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中期美國物質生活高度繁榮以後，芝加哥充塞著“窩囊破爛沉悶的貨物沉悶的建築令人厭煩的不安令人厭煩的管理沉悶的報刊沉悶的教育令人厭煩的官僚主義強制性勞動無時不有的員警無處不有的刑法，令人厭煩的黨務會議，等等……厭煩是控制社會的一種工具，而權力是強加厭煩、支配停滯、結合停滯與悲痛的力量。真正的厭煩，深沉的厭煩，無不滲透著恐懼與死亡。”²⁴“厭惡”成為工業社會中芝加哥人的一種普遍精神狀態。

與芝加哥相比，紐約是騷動而又焦慮的，既使人難以忍受、無法控制，而又魔鬼一般吸引著來自各地的人們。這裡有美國的經濟中心華爾街，美國文化中心格林威治村和百老匯。紐約市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賦予美國藝術實驗主義以民族的和國際的精神。二十世紀初，生活中毫無拘束的個人主義在格林威治村盛行，這裡既有追求自由的詩人、滿腔熱忱的情人，他們舉止優雅，低徊淺飲，但是也有呆頭呆腦的傻瓜和行為怪異的莽漢。這裡的“實驗主義精神顯得非常新穎激進，富有政治色彩；它那開放的、具有各種不同特徵的社會環境吸引了一大批新的贊助者，他們熱心於支援道德和藝術方面的實驗主義，”²⁵這對那些青年作家和藝術家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在這裡，洪堡曾給西特林講授現代主義詩歌和藝術、歐洲和蘇聯的革命，西特林有幸聆聽到了夏皮羅等人的講話。這裡的實驗主義精神既成就了洪堡等思想家、藝術家，也吸引、陶冶並鼓勵了像西特林那樣的一代年輕人，使他們在這裡沐浴到了思想與藝術的光輝。格林威治村一直見證了美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變遷。但是，對於以文化與藝術著稱的城市紐約來說，它之所以能夠這樣繁榮是因為那些曾經存在偉大的事物，而且現在依然延續著它們的生命力，但藝術精神卻已經有所改變。

三、市民生活的城市敘述

城與人密不可分，人依城而生存，城因人而充滿生機，有人之處才有城，所以，“城市是情緒、情感狀態，

大部分是集體的畸變。在這裡，人類既茁壯成長，又痛苦煎熬；在這裡，人類把靈魂投注到痛苦和歡樂中，並以痛苦和歡樂來證實現實的存在。”^⑧城市日常生活的真實內容是由生活其間的市民來譜寫的，人們的言行舉止、悲歡離合等形成了城市生動的靈魂與豐滿的血肉。所以，貝婁的作品中不是由純環境擔任起敘述情節的任務，而是強調結構上的空間性質，城市空間中活動的人、發生的事以及傳承下來的歷史構成了完整的城事。

城市建築是封閉的場所，其中存在各種限制，而街道則向所有的居民敞開。在城市的街道上，人們經常會看到居民普普通通的生活場景，遇到有趣的事情。在西特林的印象裡，20年代生活在芝加哥的孩子們一到冬雪初化的三月份，便紛紛走出家門，四處出擊去探尋所謂的“財寶”，這樣，有些泥濘的濕漉漉的城市街道成了孩子們無比開心的天然樂園。1943年的一天，約瑟夫走在街道上，看到路旁有兩個男人在鋸一棵樹，一條狗從籬笆後面跳出來，沒有任何徵兆地狂吠著，一個穿著方格紋外套和紅靴子的人站在一塊地的中央在焚燒垃圾。而一幢石屋高高的窗子前面，一個金髮男孩肩披一條毯子，纖細的手指握著一根綠色木棍當作權杖，戴著一頂紙冠，假扮國王。看到有人走過來，他突然將作為權杖的木棍變成槍支，嘴裡發出“砰”的響聲，對準來人瞄準開火，而來人則配合假裝被擊中的樣子，使得雙方都享受到遊戲的樂趣。這個電影攝影式的場景小規模地說明了貝婁小說中的形式空間化。就場景的持續來說，敘述的時間流至少是被中止了：注意力在有限的時間範圍內被固定在諸種聯繫的交互作用之中。這個有趣的場景，雖然本身對於作為一個整體的小說來說算不上重要，但它在完成了獨立作用之後，又被巧妙地溶入主要的敘述結構中。

城市是人們奮鬥、成功的場所，它記載了每個人的奮鬥史。不同於德萊塞把城市描寫為墮落的深淵，索爾·貝婁小說中的人是城市的正常居民，而非來自鄉野的闖入者，在城市中他們也可能沉迷墮落，但這卻非城市的原因，而是個人性格和社會局勢變化等諸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這個奮鬥追求的過程中，有些人失敗了，如威爾赫姆，他經常感情用事，諸事不順，為擺脫經濟上的窘境卻受特莫金欺騙，失去了僅有的七百美元。有些人在個人奮鬥中取得了成功，如奧吉的哥哥西蒙，他從小就有著虛榮心，艱難的生活壓抑著他，一旦長大，他就渴望早日擺脫貧窮，他不像弟弟那樣生活在理想中，去追尋虛無縹緲的“更好的命運”，所以在被塞西背叛後，遇到夏洛特就成了他出人頭地的救命稻草，通過婚姻，弄到了自己的煤場，並以此為起點，逐步擴張，過上了他自認為成功的生活。有些人成功後走向了失敗，早期洪堡的成功源於大蕭條後人們心中克服困難的浪漫主義情懷，他那節奏明快，妙趣橫生，富有人道主義情感的詩歌為那個物質匱乏的時代的人們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而一旦形勢發生變化，他的美好的詩句就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空談，被時代拋棄，而西特林則取代他成為時代寵兒、新的文化貴族，享受著財富和名利的尊重，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他又不知不覺地走進了自己挖掘的泥坑中，為名利所累，為財富受敲詐，他與其說是成功了，毋寧說是走向了另一種失敗。

在美國的城市中，始終生活著一些“邊緣人”，索爾·貝婁利用空間的建構與空間權利之間的衝突將這些邊緣人的生存狀態鮮明地展示出來。《晃來晃去的人》中，約瑟夫由於沒有美國國籍，雖然在芝加哥生活了十八年之久，但他的參軍申請仍需要經過一番調查，而這個調查過程幾經反復，一拖再拖，無奈他只好一個人躲在家中，無聊地打發時間。移民的身份使他成為這個城市的“他者”，“從法律的角度上說，我是那個從前的我，如果提出有關我身份的問題，我只能指向我昨日所擁有的屬性”^⑨在貝婁作品中，城市“邊緣人”不只是表現為身份的邊緣化，還有許多人是思想上主動將自己邊緣化了，他們之所以成為“邊緣人”是由於其思想與當時主流思想相悖，因此不為大多數人歡迎。美國是物質上成功的樂土，所以一般人是不会為它的意識形態而憂心忡忡的。但是，

“要當一個美國詩人的崇高理想有時讓洪堡覺得自己像是個怪人、孩子、小丑，或傻瓜。我們像流



浪蕩和畢了業的學生一樣，在渾渾噩噩中打發日子。或許美國是不需要藝術和內在的奇跡了，因為它外在的奇跡已經足夠了……因此，洪堡的所作所為勢必成為離奇滑稽的笑料……洪堡在苦苦思索著，如何在過去與現在、生與死之間周旋，才能使某些重大問題得到完滿的回答。然而，苦思冥想並沒有使他頭腦清醒。於是，他便試著吃藥、喝酒，到頭來不得不採取好多療程的電休克療法。正出他所經歷的那樣，最後形成的局面是洪堡與瘋狂的鬥爭，而瘋狂完全占了上風。”²⁸

最後的結果是洪堡從思想到肉體的徹底消失。比起身份上的“邊緣人”，思想上的“邊緣人”承受的壓力更大、敵意更多，身份上的“邊緣人”可以通過適應走向同化，而思想上的“邊緣人”處於衝突的中心，除非放棄自己的立場，否則，社會對他們的敵意是有增無減的。

一般而言，家庭是在具有婚姻和血緣關係的親屬之間建立起來的，但現代美國家庭中的人們更為重視的是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人們更多的是奉行價值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所以，雖然在城市家庭中雖然也存在著溫馨的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愛，例如奧吉的童年時代就是在母親的辛苦操勞和兄弟團結中度過的，雖然父親不知所蹤，弟弟喬治有些白癡，但母子四人和房客勞希奶奶一人一狗生活在一起，畢竟留下了溫馨的回憶。但更多美國家庭中以親情、愛情為基礎的親屬關係已經解體，常見的是家庭成員之間的由於感情的、財產的和生活的問題所引發的衝突，貪婪和欲望支配著現代人的生活，真正的親情反而被誤解。西特林得知哥哥要動手術，就在赴歐洲的途中去探望他，不想朱利斯卻以為他是為了一旦發生不測能夠分得一份財產，因為在哥哥的心目中到處都是騙局。瑪德琳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背叛自己的丈夫，而且離婚後還要找律師侵吞赫索格的財產，“他們會把你這個混蛋的腸子都打上結，在你的鼻孔上放個計量器，按量向你收取呼吸費。他們會把你前前後後都鎖起來。到那時你會覺得還是死了的好。”²⁹華萊斯在他父親病危時不管不顧，一門心思地想要找到父親藏匿的金錢，甚至不惜拆毀了頂樓房間裡的水管。妹妹安吉拉去探望父親，卻不是出於親情，而是冀此讓父親修改遺囑。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使得一些人不顧親情，一味追逐自己的利益，對此威爾赫姆慨歎道：“他們崇拜金錢！神聖的金錢！迷人的金錢！……你手中若無錢，你便是一個笨蛋，一個笨蛋！你就不得不對這個花花世界敬而遠之。”

大衛·哈威在《後現代狀況》中指出，現代城市，其空間形式，不是讓人確立家園感，而是不斷地毀掉家園感，不是讓人的身體和空間發生體驗關係，而是讓人的身體和空間發生錯置關係。著名建築學家芒福德也認識到“大都市各種各樣消極的生命力迅速地生長著。在這樣的環境中被擾亂了的自然和人的本性，以破壞性的形式重現了：毒品、鎮痛劑、春藥、安眠藥、鎮靜劑，都是這個惡化的狀態下必需的陪伴物”，當“犯罪、醜行、兇殺、失常、恐怖，比比皆是”已然“成為現實”，“而我們還把這些譽為人性，人的特徵”³⁰時，都市基本上就變成異化和非人格化的場所，當放縱與犯罪成為美國大都市司空見慣的景象時，“美國夢”也日漸蛻化為“美國噩夢”。

殖民地時期美國清教主義思想流行，人們在性觀念上十分嚴謹，但後來隨著享樂主義的盛行，刺激著人們在性行為上的混亂與放縱，6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性解放也成了一個主要方面，這使得美國社會中一些人的性行為超出了道德和法律的限制，而且美國的法律規定個人和社會對自由的性行為無權干涉，即使身為父母也管不了自己兒女混亂的性生活：

“一旦接受了新的概念，你就再也無須擔心是非善惡了。不用顧慮善惡的藉口是你已經在教育上傾注了心血。你在有限的科目上努力用功，掌握了它，你便永遠清醒了。你會說：‘負罪感必須消亡，人類有權享受沒有罪惡的快樂。’上了這寶貴的一課，你現在就能接受女兒混亂的性生活了，而這在過去會使你休克。”³¹

安吉拉不但和陌生人發生性關係，還在墨西哥度假時與他人交換性伴侶，進行性雜交。瑪德琳原屬女

子學院的同性戀團體，所以她父親認為她與赫索格相識十分幸運，“她不該再和那班搞同性戀的鬼混在一起了……她對你發生了興趣，這是好事情。”^②但擺脫同性戀危險的瑪德琳不久就沉迷在與格斯貝奇通姦的興奮中了，這種行為非但沒有受譴責，反而有許多人為她辯護。在現代美國，夫妻之間的不貞和個人生活中的性氾濫成為肢解家庭的主要力量，整個社會都在愛與欲的矛盾中掙扎著。

貝婁筆下的居民不僅笨拙地跌進自己欲望的陷阱中，還無法逃避由律師、員警和法庭所組成的法網。在對金錢的掠奪中，“法官律師們早已在金錢世界的中心為己建立了強大的陣營——成了王中之王。”^③由於美國司法審判實行的是陪審員制度，所以一些行為不端的律師就採用花言巧語的狡辯、公然招搖撞騙、用暴力手段恐嚇證人、煽動輿論攻勢等不光彩的手段為案件的當事人辯護，從而影響甚至決定陪審員的判斷。在西特林夫婦的離婚訴訟中，丹妮絲的代理律師平克斯弄虛作假，向法庭出示西特林以前發表的文章，以此作為西特林賺錢能力的證據。受到他的蠱惑，法官不加思考地判西特林每年支付給妻子一萬五千元美金直至他們的女兒成年為止。律師和法官除了助紂為虐外，他們中有些人還親自行動起來，把他人的信任當作獲得不義之財的捷徑，《院長的十二月》中，律師麥克西受表弟科爾德委託代其投資，卻在獲得各種授權後將科爾德的財產轉移得一文不剩，因而嚴重地損害了自己的聲譽。律師和法官巧取豪奪，甚至與犯罪分子沆瀣一氣，員警也對城市的一些犯罪行為漠不關心，因為人手不夠，有很多的會議、宴會、重要人物和高級將領需要他們去保衛，所以普通人的財產甚至生命安全就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遇上了只能自認倒楣，而賽姆勒的報警就成為一件自討沒趣的事情。

普通民眾居住在城市中，各種犯罪分子也混跡其間，他們破壞著城市的秩序與安寧。二十世紀 20 年代的芝加哥市是全美罪惡的中心和匪徒的聖地，在奧吉的少年時代，匪徒和黑幫就光明正大地生活在其周圍，他們嗜好暴力血腥，經常盜竊，為一些爭端而大打出手，有時參與殺害黑人。後來黑幫和匪徒不復昔日的風光了，但在芝加哥仍然經常發生打群架的事情，貧民區裡還是兇殺不斷，70 年代以後，雖然恐怖活動大大收斂，但是歹徒兇殺、種族迫害和道德敗壞等情況醜惡現象仍舊存在著，小偷明目張膽地將扒竊之手伸入別人的口袋中，盜賊團夥則將別人的汽車輪子卸下來賣掉，即使員警佩槍也被盜。坎特拜爾混跡於芝加哥，為算計西特林一直糾纏不休。在紐約，騙子特莫金利用發大財的謊言騙走了威爾赫姆口袋裡僅存的幾百元錢，在芝加哥，奎多·斯特朗森冒充哈特福德保險公司經理開設投資公司，騙了顧客幾百萬美元。當人們發現一個印第安人由於受到槍擊倒在郵局前邊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自依舊坐在板凳上，坐在舊汽車裡，無動於衷地看著他，直到他因流血過多而死去。”^④乘坐濱河大道的公共汽車時，賽姆勒先生不止一次地見到黑人青年扒竊乘客們的錢包，然而當他撥打報警電話後被員警冷漠地置之不理，對此他十分困惑，這個世界怎麼了，人們為什麼這樣麻木不仁？他的侄女瑪戈特給他解惑道：

“這個觀點是說，在這裡邪惡是沒有偉大的精神的。那些人太微不足道了，姑夫。他們不過是一些下層階級的人物，是管理人員，小官僚，或者是流氓無產階級。一個大眾的社會不會產生大罪犯，這是由於遍及整個社會的分工打破了一般責任心的全部概念。代替這種一般責任心的是計件工作。這就像沒有參天大樹的森林，你只能嚮往那些根子紮的很淺的花花草草。”^⑤

結語

空間形式是各種字面因素的一個創造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空間形式體現了對現實的較為強烈的附著，以感覺和環境的真實為目標，但是文學空間只存在於精神之中。在美國的城市中，有著貧與富，有著罪與罰^⑥，有著美好生活的回憶和現實困境的無奈，有著奮鬥的心酸和成功的快樂。在美國的城市中，索爾·貝婁觀察著，見證著，他用文字建構著對美國城市的總體印象，在任何瞬間都為人們提供了美國城市的過去

和現在的完整知識,同時質疑著現代城市的興衰榮辱,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去喚醒人們追尋精神家園,去詩意地棲居,他筆下的主人公們愛著、恨著、掙扎著、追求著、奮鬥著,不管成功還是失敗,他們都演繹著自己的精彩人生,通過自己的經歷展示著現代美國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大城市的文化精神。

注釋

- ①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1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298。
- ②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106。
- ③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101。
- ④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24。
- ⑤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245。
- ⑥ 索爾·貝婁:《洪堡的禮物》,蒲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頁173。
- ⑦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109。
- ⑧ 索爾·貝婁:《赫索格》,宋兆霖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頁334。
- ⑨ 索爾·貝婁:《洪堡的禮物》,蒲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頁106。
- ⑩ 索爾·貝婁:《赫索格》,宋兆霖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頁55。
- ⑪ 戈登·勞埃德·哈珀:《索爾貝婁訪談錄》,《青年文學》2007年第5期,頁126。
- ⑫ 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後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137。
- ⑬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25。
- ⑭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1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209。
- ⑮ 路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宋俊嶺、倪文彥譯,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頁91。
- ⑯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9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16。
- ⑰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206。
- ⑱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240。
- ⑲ 索爾·貝婁:《洪堡的禮物》,蒲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頁504。
- ⑳ 索爾·貝婁:《洪堡的禮物》,蒲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頁131。
- ㉑ 馬·佈雷德伯裡編:《現代主義》,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頁129。
- ㉒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1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271。
- ㉓ 索爾·貝婁:《洪堡的禮物》,蒲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頁80頁。
- ㉔ 索爾·貝婁:《洪堡的禮物》,蒲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頁228-229。
- ㉕ 馬·佈雷德伯裡編:《現代主義》,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頁133。
- ㉖ Bellow, Saul. (1982). *The Dean's December*. London: The Alison Press.
- ㉗ Bellow, Saul. (1977). *Dangling M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㉘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19。
- ㉙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122-123。
- ㉚ 索爾·貝婁:《洪堡的禮物》,蒲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頁540。
- ㉛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1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2。
- ㉜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145。
- ㉝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1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38。
- ㉞ 索爾·貝婁:《洪堡的禮物》,蒲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頁271。
- ㉟ 宋兆霖主編:《索爾·貝婁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19。
- ㊱ 《院長的十二月》中殺害白人研究生的那兩個黑人青年最後終於被判刑,《更多的死於心碎》中靠不法手段獲得本該由外甥繼承的遺產的政客和商人維裡茨也成為被告,死於心臟病猝發。